



冯友兰作品精选

冯友兰作品精选

三松堂
自序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松堂自序 / 冯友兰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9.5

(冯友兰作品精选)

ISBN 978-7-108-03098-6

I. 三… II. 冯… III. 冯友兰 (1895~1990)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3234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面设计 宁成春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5月北京第1版
200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13.25

字 数 240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9.80元

冯友兰作品精选

出版前言

“冯友兰作品精选”收入作者大部分重要论著，由我店分两辑出版。先行付梓的第一辑七种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上六种即“贞元六书”）和《南渡集》；现在刊行的第二辑则包括《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自序》等，一共四种五册。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等职。20世纪30年代初，他完成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该书多次重印，为国内外学习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经长沙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并于颠沛流离之中完成了“贞元六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在此期间用英文著有《中国哲学简史》，该书的语言风格及思想涵蕴别具风采，深受外国读者欢迎，先后有法、意、日、韩等12种语言的译本出版。1949年后，冯友兰

辞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校务委员会主席之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曲折，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又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20世纪40年代的“贞元六书”构成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危机，而冯友兰在撰写六书时，怀抱了抗日战争必定胜利的信念，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战胜困难复兴起来。他把当时的情形称为“贞下起元”，把这六部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又称“贞元六书”。所谓“贞下起元”就是冬尽春来，表示最大的困难正在渡过，新的发展即将到来。“贞元之际”的提法充分显示出冯友兰以哲学创作的方式自觉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

1949年以后，冯友兰的“贞下起元”这一信念发展为“旧邦新命”的提法。“贞下起元”着重于民族生命一阳来复的转折点，强调了对民族生命的信心，有强烈的现实意味；“旧邦新命”则脱胎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充满了通观古今的历史感。1980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出版，他在自序里说：“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冯友兰一生的著述事业始终贯穿着强烈的文化信念，这一信念可最终概括为“旧邦新命”一语。1987年，92

岁的冯友兰在一篇文章中再次申说此意：“《诗经》有一首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我把这两句诗概括为‘旧邦新命’这几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足以当之。‘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

* * *

“冯友兰作品精选”以蔡仲德先生编纂的《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为底本，其中有些标点、句式的用法与现在的规范有所不同，为保持原著面貌，均未作改动（《中国哲学简史》则采用新近的赵复三译本）。另外，各书中使用了许多“底”字，作为助词的“底”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的”字没有区别，但在当时的语言习惯中，表示定语与中心词之间是领属关系时，“底”一般不通用为“的”，请读者根据文意加以区别。

各书中的一些译名也与现在一般通用的有所不同，如“海格尔”今译为“黑格尔”，“圣多玛”今译为“圣托马斯”等，斯宾诺莎的《致知篇》今译为《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心的形态学》今译为《精神现象学》等，本次出版也未作改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9月

《自序》之自序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 19 世纪 90 年代，迄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揆之旧例，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

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志谢。

冯友兰

1981年11月

目 录

《自序》之自序	1
---------------	---

一 社会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3
第二章 民国时期	36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44

二 哲学

第四章 二十年代	219
第五章 三十年代	237
第六章 四十年代	273
第七章 五十年代及以后	371

三 大学

第八章 北京大学	351
第九章 清华大学	369
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	387

四 展望

第十一章 明志	405
---------------	-----

一 社会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他做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做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做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做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做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做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学

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

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那时候，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

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船家又来告诉，说明天进汉江，这是大河，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进了汉江，一路顺利，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船先停在汉口，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父亲来了，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过要过长江，若是下了这条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麻烦，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

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渡过长江，搬到租的房子里边。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一到这房子里边，都不舒服极了。

在武昌租的房子，外边只有一条很窄的巷子，里边只有一个天井。说它是天井，倒也名副其实，站在院子里看天，真像《庄子》所说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我母亲尤其觉得不习惯，院子没有内外之分，很不成体统，不像个样子。后来搬到黄土坡，天井比较大一点，大门外还有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院子还是没有内外之分。不过母亲不久也就看惯了，习以为常了。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上学的问题。经常听见父亲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情。如果我要再大几岁，父亲就要我上方言学堂了。父亲很重视学外文。方言学堂的学生也受到很优厚的待遇，除了管吃管住外，每月还发几两银子，作为零用。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可是我岁数不到，没有办法。附近也有小学，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还是以不上小学为好。因为父亲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再者我们都是外省人，小孩到小学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他们很不放心。因此他们决定一个办法，叫母亲在家监督我们读书。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有些字只能读其音，不能解其义。不过那时候教小孩们读经书，无论哪个先生也都是着重读和背，只要读熟了能背就行，本来